

越南勞動黨領導武裝鬥爭
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
的主要經驗

武元甲

越南外文出版社

越南勞動黨領導武裝鬥爭
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
的主要經驗

武元甲 著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3年·河內

**越南勞動黨領導武裝鬥爭
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經驗**

武元甲 著

*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新越華報印刷廠印刷

*

1963年2月河內第一版
1963年2月河內第一次印刷
印數1——2,165冊

目 錄

- 一、我黨領導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和
1945年八月總起義的成功……………4
- 二、我黨勝利地領導了反對法帝國主義和
美國干涉者的長期抗戰事業……………17
- 三、我黨成功地領導了人民的
革命武裝力量的建設……………36

我黨是在國內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誕生的。黨在成立初期就領導農民起來暴動，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因此，黨對革命政權和武裝鬥爭問題早就有了正確的認識。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教導的，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中的頭等重要的問題。1932年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行動綱領，已把武裝鬥爭的道路視爲解放羣衆、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權的道路。

儘管1930—1931年的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但我黨仍然繼續領導羣衆時而不合法時而半合法地進行政治鬥爭，並大力恢復革命基層組織，促進革命運動。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國內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爲了實現民族解放的任務而提出了準備武裝起義的問題。從此，我黨就領導人民準備武裝起義，並使1945年8月的總起義獲得勝利。接着，在整整九年中，我黨領導了全民的長期抗戰事業直至勝利。

在三十年革命運動中，在前十五個年頭黨還處於不合法的地位，以後革命政權在全國範圍內成立，黨就成了一個執政的黨。自從黨領導國家以來，在武裝鬥爭期間以及在和平恢復的近幾年來，建設革命武裝力量始終是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爲革命武裝力量是革命政權的主要成分。

回顧過去所走的路，可以看到武裝鬥爭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的革命運動過程中很明顯地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經過多年極其艱苦和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我黨已積累了許多非常寶貴的經驗。學習這些經驗，對加強革命武裝力量的建設、鞏固我們北方的國防和繼續完成全國範圍內的民族民主革命事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無論在哪個國家，革命武裝鬥爭都有着共同的基本規律。同時，每一個國家的革命武裝鬥爭，又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

俄國原來是一個帝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俄國十月革命，是工人階級、士兵和城市勞動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的起義。緊接着的革命戰爭，是蘇聯工農羣衆和勞動人民反對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白衛軍的革命內戰，也是反對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聯軍干涉的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戰爭。以後蘇聯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圈內的、已經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侵略軍的革命戰爭。

中國原來是一個農業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土地廣闊、人口佔世界第一位。中國的武裝鬥爭，在一段長時期內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革命內戰，在抗日時期則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長期的革命戰爭。這種武裝鬥爭，旨在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目標，爲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開闢道路。

我們越南原來是一個農業經濟極其落後的殖民地和半封

建的弱小國家，土地不大、人口不多。這裏的武裝鬥爭，是全國人民的以起義形式和長期抗戰形式，推翻帝國主義和反動封建勢力的武裝鬥爭，像中國一樣旨在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目標，為民族爭取獨立，給農民帶來土地，為我國向社會主義前進創造條件。

因此，越南的革命武裝鬥爭，固然反映了革命武裝鬥爭的共同規律，但同時也有它具體的特點和規律。我黨領導武裝鬥爭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這個勝利，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戰爭和建設革命武裝力量的原理，創造性地和巧妙地運用於在帝國主義包圍圈內的和必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反對一個強大敵人的殖民地 and 半封建的弱小國家的具體環境的勝利。

我黨領導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和 1945年八月總起義的成功

1939年，在歐洲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黨中央就及時地作出分析，即戰爭周期和新的革命已經開始了，“印度支那的革命已發展到民族解放的革命階段”。跨入1940年和1941年年初，北山、南圻、都良起義連續爆發。儘管這些起義都被敵人殘酷鎮壓，但“這是全國總起義的信號，是印度支那各民族以武力進行鬥爭的開始。”①

的確，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我國人民在法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雙重統治下過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儘管革命運動受到殘酷的鎮壓，我黨仍然大力開展對羣衆的宣傳動員工作，把一切愛國力量集合在越盟陣綫中。積極建立游擊根據地，建立革命武裝力量，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①1941年黨中央第八次會議決議。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和同盟國軍隊取得巨大勝利，日本法西斯投降，起義的氣勢在全國各地沸騰着。從城市到農村的成百萬羣衆起來遊行、示威。總起義爆發，八月革命成功。9月2日，胡志明主席代表臨時政府向全體國民和世界宣讀獨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國——東南亞第一個人民民主國家誕生了。

八月總起義的偉大勝利，結束了越南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日、法法西斯的高潮，推翻了帝國主義近百年來的統治，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八月總起義在越南民族歷史上開闢了新的紀元——人民站起來掌握自己命運的紀元。

在世界大戰期間的起義準備工作和八月總起義，給我們帶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八月革命》一書中，長征同志對八月革命的優點和不足之點已作了分析，並作出了許多正確的評價。在本文中，我將從準備武裝起義直到起義勝利的整個過程，提出幾點主要經驗，這些經驗也是我黨領導工作中的巨大成績。

一、八月总起义的胜利，首先是由於党中央在民族解放問題上战略指导的正确，把它視為全民的中心任务，必須集中所有的爱国力量坚决来实现。

我國是一個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在我國社會中的兩個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同我國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封建地主

階級同我國人民（主要是同農民羣衆）之間的矛盾。在這兩個矛盾中，必須把帝國主義同我國民族之間的矛盾視爲最主要的矛盾。因此，越南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它具有兩個基本任務：反帝和反封建的任務。在這兩個任務中，反帝、打倒帝國主義以求得民族解放的任務，必須視爲最主要的任務。具體的是，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互相緊密勾結，所以主要矛盾，是包括所有的愛國力量的我國人民同帝國主義、最反動的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自從1930年，我黨就分析了我國社會的兩個矛盾和提出了越南革命的兩個任務，因此能够深廣地發動革命運動。但直到1939—1941年，才清楚地認識到反帝任務和民族解放任務是最主要的任務。再者，由於正確地分析了當時世界和國內形勢中的巨大轉變，所以黨把民族解放任務視爲全民的迫切的任務。

1939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第六次會議已明確指出：“現在形勢已經改變了。目前，法帝國主義正是發動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罪魁之一。它在各殖民地的統治（例如在印度支那）很明顯地是法西斯軍閥的統治制度。法帝國主義向日本妥協投降的陰謀，把印度支那各民族存亡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生存道路，除了打倒法帝國主義，爲爭取解放和獨立而反對無論是白種人或黃種人侵略者的統治枷鎖外，別無他途。”

1941年召開的中央第八次擴大會議，制訂了民族解放革命的具體綱領，確定了黨對革命的指導方針的轉變，會議認爲：“當前，黨的口號是，首先要使印度支那各民族從法一日

強盜的統治枷鎖下解放出來。要圓滿地完成這個任務，首先一定要把印度支那的愛國力量集合起來。凡有愛國心的人都集合在統一戰綫中，傾盡全力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粉碎侵佔我國的法日強盜。把所有各階級、黨派、救國的革命組織、各宗教和各抗日民族的力量結成聯盟，是我黨的主要工作。”

黨中央還訂出黨的新政策，暫時不提出土地革命口號，而以減租減息，沒收帝國主義和越奸賣國賊的土地分給農民的口號來代替；同時決定成立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和其他救國組織。

從強調民族解放任務這一點來說，黨中央第八次擴大會議決議是非常正確和英明的，它非常符合當時的形勢，符合各個愛國階級和愛國階層的基本的深切的願望。正因為這樣，僅在一個短時期內，越盟陣綫已能够集合廣大人民的力量，成為革命羣衆的最強大的政治組織。越盟陣綫的綱領獲得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越盟陣綫的聲望傳遍全國。黨中央第八次擴大會議決議是對八月革命的勝利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具體綱領。

這裏也應說明：當時在戰略方面，黨對封建地主階級是革命對象這一點沒有肯定的認識；在理論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又把民族解放任務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截然分開。同時又過高地估計地主階級，對工農聯盟是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強調不夠。這些缺點，使我黨以後的思想和工作都受到影響，具體的是，在取得政權後和抗戰的頭幾年裏，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反封建的任務。

二、八月总起义的胜利，是由於随着当时革命任务的改变，党中央及时地改变了鬥爭形式，並提出準備总起义的問題。

從政治鬥爭轉爲武裝鬥爭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它要求經過整個的準備過程。如果說起義是一個藝術，那麼這藝術的主要內容，是必須懂得領導改變鬥爭形式使之適合於每個階段的政治情況，必須懂得在每個時期中保持政治鬥爭形式和武裝鬥爭形式之間的正確關係。開始時政治鬥爭爲主，武裝鬥爭爲輔，逐漸地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變得同樣重要，進而發展到武裝鬥爭形式佔主要地位的時期，但就在這個時期中，也必須認識到什麼時候武裝鬥爭是在局部範圍內佔主要地位，什麼時候才在全局範圍內佔主要地位。根據鬥爭形式而制訂出組織形式和工作方針。在當時的情況下，敵我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如果鬥爭指導和組織指導不正確，也就是說不正確地按照既堅決又慎重的方針，正確地估計主觀條件和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對比，那麼一定會遇到困難和失敗。正確地指導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必須保證鞏固和及時地發展革命力量，直到起義時機成熟爲止。

中央第八次擴大會議明確提出：

“要想爲起義準備力量，我黨必須：

- 一、鞏固和擴大各個救國組織；
- 二、在城市、產業區、礦區、莊園中擴大組織；
- 三、在革命運動還弱的省分和少數民族地區擴大組織；

四、培養黨員具有堅決犧牲的精神；

五、培養黨員具有足夠的能力和經驗，具有指揮能力和隨機應變的本領；

六、必須建立各游擊小組和在敵軍士兵中建立組織。”

當談到起義時，列寧曾強調指出：“起義必須依靠羣衆的革命高潮”而“不能依靠任何的陰謀”。提到準備武裝起義，提到起義，並不意味着不再重視羣衆的政治運動了；相反地，如果沒有革命羣衆的深廣的政治運動，就不可能取得起義的勝利。因此，要想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最主要、最重要的工作是對羣衆進行宣傳和組織，必須“鞏固和擴大各個救國組織”。只有在強大的政治組織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半武裝組織，進而建立與革命羣衆有着密切聯系的游擊小組和游擊隊，這樣才有活動和發展的條件。

在最初的幾年，人民的政治運動的發展還不強大，敵人的力量還很穩定，因此，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必須以在羣衆中進行政治宣傳鼓動為主。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在那些衝要地區，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中央很早就選擇了越北山林地區，以北山—武崖和高平兩個地區爲中心，建立武裝根據地。在當時的條件下，武裝根據地必須是秘密根據地，必須是那些有穩定的革命運動、有堅強的羣衆組織的地方；在羣衆的政治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自衛隊和戰鬥自衛隊，逐漸發展成地方上的脫產和半脫產的武裝小隊或中隊，然後根據條件再發展成更大的游擊隊。地方上的秘密幹部組、秘密軍事組、武裝衝鋒組、武裝小隊、武裝中隊等各種形式的組織，都已經逐漸出現。進行活動的最合

適的方針是政治重於軍事，宣傳重於作戰的武裝宣傳方針，用武裝活動來保衛、鞏固和發展政治基礎，由鞏固和發展政治基礎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武裝和半武裝力量。上述的武裝和半武裝組織，在開始的時候一定要保密，宣傳活動或鋤奸活動必須有重點，開始時作戰必須“非常秘密、迅速、來無影，去無蹤。”這樣才能保持住羣衆的合法鬥爭。建立革命政權的問題還未提出來。有些地方，羣衆全部參加救國會，鄉越盟委員會就像秘密的革命政權組織一樣，自然地在羣衆中有了威信，但是就在那些地方，我們也不推翻敵人的政權，而只設法爭取它、利用它。根據上述方針，黨中央給北山一武崖的各個救國軍單位下了指示，胡主席也給高平一北滑的各個武裝組織指出了武裝宣傳的方針特別是作出了成立越南解放軍宣傳隊的指示。經驗證明，在準備武裝起義的初期，如果沒有掌握好上述的工作方針，革命運動就往往會遭到暫時的困難和損失，因而影響到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當主張加強衝要的鄉村的政治基層組織的時候，黨中央已指出在城市、產業區、礦區、莊園中發展羣衆組織的必要性。因為如果只注意農村，不注意城市，特別是不注意敵人首腦機關的所在地，就很難發動起義而獲得勝利。另一方面，爲了做好起義的準備工作，與組織游擊隊的同時，黨中央還重視對敵軍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提出了工農兵聯合起來的口號。

1945年3月9日，日本法西斯向法帝國主義發動進攻，使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法帝國主義被打垮，而越南人民當時的主要敵人——日本法西斯——則還來不及鞏固它在

印度支那的統治，並且正在各個戰綫上連續吃敗仗，黨中央對由於日本法西斯發動政變而造成的新的政治危機的形勢作出了非常英明和及時的分析，發出“發動一個氣勢強大的抗日救國高潮，作為總起義的前提”的指示，積極促進準備工作以便“時刻準備着一旦條件成熟便轉向總起義”。黨中央還提出“發動游擊戰爭以建立根據地”的主張，統一各武裝力量，在游擊隊活動的地區組織革命政權，在羣衆基礎良好的地方組織秘密政權。

從高平—北淞到太原—宣光和中游地區的一些地方，解放軍和救國軍的各個單位攻入各州縣，建立革命政權。打開穀倉的運動在各地蓬勃發展，越盟的各個名譽隊甚至在各都市活動。自衛隊、戰鬥自衛隊、人民委員會和解放委員會等組織擴展到各地。在廣義省，巴德游擊隊成立。起義前夕的氣氛沸騰着。

1945年4月，北圻軍事會議決定把各革命武裝力量統一起來，取名越南解放軍，並建立革命根據地，組織北方革命軍事委員會。同年6月，建立了解放區，越盟的十大政策在解放區的六個省的農村中獲得施行，越盟的氣勢愈來愈強。解放區和解放軍的影響迅速擴大，更鼓舞了我國人民積極準備，等待時機，使各中間階層逐漸傾向革命，敵人日益驚慌和分化。

實際上，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從1945年5月就已跨入新的階段，其特點是各地的抗日救國高潮高漲，發動了局部的游擊戰爭，成立了地方的革命政權，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我黨的領導使運動強大和穩當地向前發展。

三、八月总起义胜利，是由於我們党中央正确和英明地提出了在什麼样的条件下总起义才能爆发並取得胜利，因此能夠動員全党和全民，发挥了羣众的坚决、勇敢、积极和創造的精神。

當談到起義時，斯大林曾指出選擇時機是取得起義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他說：必須十分正確地選擇時機打決定性的一仗。危機已發展到頂點；先鋒隊已做好最後鬥爭的準備；後備力量已做好支持先鋒隊的準備；敵人的隊伍已混亂到極點的時候，也就是開始起義的時機。

我黨已有宜一靜暴動和南圻起義的血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證明了起義的時機問題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因此，在1941年，中央第八次擴大會議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領導人民舉行起義的條件：“印度支那革命必須以武裝起義來結束；要想進行武裝起義，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救國陣綫已在全國統一；

人民在日一法統治枷鎖下，實在不能生活並時刻準備着犧牲來參加起義；

印度支那統治集團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發生危機；

其他對起義有利的客觀條件，如中國戰勝日本；法國和日本爆發革命；民主陣營在太平洋和在蘇聯的勝利；法、日各殖民地的革命沸騰，特別是中國軍隊或英美軍隊開入印度支那。”

1944年5月，越盟總部的準備起義的指示也清楚地指出要在什麼時候領導人民舉行起義：

“必須在：

- 1、敵人分化、驚慌到極點；
- 2、各救國團體和革命戰士已決心奮起殺敵；
- 3、廣大人民羣衆已經熱烈贊成起義，並決心支援先鋒隊。

如果我們正確地選擇時機來發動起義，那麼我們的民族解放革命一定勝利。必須時刻清醒，把握好運動的脈搏，注意羣衆的情況；清楚地認識世界局勢和每一個時候的形勢，以便抓住良機，及時地領導人民羣衆奮起舉行起義。”

在日本法西斯推翻印度支那的法帝國主義以後，黨中央在1945年3月12日的歷史性的指示中，英明地做出分析說，當前形勢有許多新的有利條件，但“起義的條件還未成熟”，同時黨中央更進一步指出，當同盟軍開進印度支那的時候，當日本法西斯軍隊迎擊同盟軍而忽視背後的時候，那就是發動起義最有利的時候。指示還指出：“如果日本的革命爆發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政權成立，或者如果日本像1940年的法國那樣亡國和日本遠征軍失去了戰鬥精神，那麼即使同盟軍還沒有登陸，我們的總起義仍然可以爆發並取得勝利。”國內的革命運動猶如潮水滾滾上漲。世界局勢迅速變化。1945年8月8日，蘇聯紅軍攻入中國東北，日本最强的關東軍只在幾天內就完全瓦解。日本法西斯處於非常危困的境地並準備無條件投降。就在這個時候，正在新潮舉行的中央擴大會議同越盟總部決定發出總起義和在全國範圍成立人民政